

新石器时代南方卷

陆建芳 ● 主编



方向明 ● 著

# 中国 玉器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

新石器时代南方卷

---

方向明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 新石器时代南方卷 / 陆建芳主编;  
方向明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387-2

I. ①中… II. ①陆… ②方… III. ①古玉器—文化  
史—中国—新石器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9520号

### 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XINSHIJI SHIDAI NANFANG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任编辑 陈 嫣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78)

印 刷 雅昌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590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00.00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sup>[1]</sup>，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sup>【1】</sup>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sup>【1】</sup>。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珪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sup>【1】</sup>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sup>【1】</sup>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按**照现代地质矿物学的概念，玉分为硬玉和软玉两大类，硬玉主要是指出产于缅甸的翡翠，软玉是指以和田玉为代表的阳起石—透闪石系列矿物。中国古代玉的主体是软玉，古人对于玉的认识，可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玉，石之美者，有五德”以及《礼记·学记》之“玉不琢，不成器”为代表，前者也是对管子玉有“九德”、孔子玉有“十德”等观念的归纳，可见中华玉实际是“美”和“德”的载体。

美的产生源于史前人类万物有灵以及生死观念的形成，如“装饰品”、狭义“艺术品”的最早出现。对于“美”的概念大家的认识均有所不同，感官系统所感受的愉悦即美。美与精神世界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新石器时代—先秦阶段，精神领域的内涵是通过美的一系列艺术品体现出来的，在古代东方，这些系列的艺术品主要包括玉器、漆器、丝绸、吉金（青铜器）等，其中以古代东方的玉器尤为显目重要。

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出土于距今约 12000 年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而东亚大地上最早从美石中析出的玉，目前可以上溯至距今 8000 年，以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早期为代表。

距今 5500 年至 5300 年左右，东亚大陆基本确立了以透闪石软玉为主的用

玉体系，社会属性的玉完全和自然属性的矿物质玉结合在一起了，此后至今约4000年，形成了东亚大陆琢玉用玉的高潮期。《越绝书》风胡子所云“夫玉，亦神物也”、“巫以玉事神”的玉礼器，是东亚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研究者进一步表述为“玉和玉器的观念贯穿着中华古文明的全过程，也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sup>[1]</sup>。东亚大陆的史前玉器以良渚文化最为突出，成就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2008年“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大会”上也提到：“良渚文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果把良渚文化玉器比作一顶皇冠，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成就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四大物质载体（彩陶、玉器、青铜、漆器）中，玉器最为源远流长，在民族文化里底蕴最为深厚、生存力最为顽强”<sup>[2]</sup>。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秉琦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条块”说，他将中华大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sup>[3]</sup>。张光直曾对这一理论进行过评述<sup>[4]</sup>。这一学说的意义除了建立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基础之外，还在于探索文明起源及其过程在各地的实证。几乎也就在稍后阶段，以聚落考古为核心探索社会组织形态和以玉器为核心探索精神领域层面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开始得到大多数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认同。

纵观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现，也可以分为六大地区：以辽河流域为

[1] 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185页。

[2]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纵论玉文化》，摘自 [http://www.yuhang.gov.cn/class/class\\_711/articles/111991.html](http://www.yuhang.gov.cn/class/class_711/articles/111991.html)。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第29~31页。

[4] 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0年，第175~176页。

中心的东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华南—台湾地区（太平洋西岸岛链中的一环）。与文明起源的“条块”分区基本吻合是完全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目前主要是以陶器来界定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那么表面上仍以物质形态为表征的玉器，则无疑包含了当时人们共同体所共同认同、归属的集体观念意识形态，作为当时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琢玉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琢玉工艺和玉器自然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的世界观和社会总体价值取向，这无疑是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一个指示器和风向标。2007年“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论坛”上，郭大顺以《红山玉器的历史定位》为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玉器作为史前考古文化中技术含量与文化含量最高的文化因素，拉近了考古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使玉器研究作为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史前考古和重建史前史有迅速推动。”一些考古学家也持有同样精辟的见解，如张长寿在回答施劲松关于辨别一种考古学文化是侧重青铜器还是陶器时，说道：“青铜器是上层的東西，陶器是基层的。发掘中碰到最多的是陶器，但一个文化最尖端的恰恰是上层统治者占有的东西。要认识一个文化的发展程度，不研究它尖端的東西是认识不清楚的。”<sup>[1]</sup>

一般认为，我国古玉的发展可以划分为神秘化与神圣化、礼仪化与人格化、人间化与世俗化三个阶段<sup>[2]</sup>。第一阶段的神秘化、神圣化还可以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玉器是“粒状”阶段，个体较小，对原料基本不做分割，外形常作圆形或圆弧形，均光素无纹，器类主要有管状玦、条形璜、圆鼓形珠和“匕形器”等，以串状的长向组合为特点，原料多就地取材，以石英类、叶蜡石为多，主要发现于兴隆洼文化和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早期阶段；随着琢玉工艺的发展，中期阶段开始追求玉面的扩展，出现了横向宽面的组合玉

[1] 《商周考古纵横谈张长寿先生访谈录》，摘自 <http://www.kaogu.cn/cn/detail.asp?Productid=8445>。

[2] 牟永抗：《试论中国古玉的考古学研究》，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57~90页。



件，最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就是桥形和接近半璧形的璜，以及扁平状的环境形玉器。玉料开始使用并逐步确立“软玉”为主体，目前比较明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以及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也有不少发现；晚期玉器是“块状”阶段，追求总体量的扩展，镶嵌件的出现是体量增长的另一个层面，小个体玉件的缀合也起到了视角感受上大体量的效果，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良渚文化玉器的琮、璧、钺以及“神人兽面像”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联系到当时的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财富流向及人群社会地位的分化等因素，正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时期，也称为“玉器时代”。

以秦岭—淮河为界的我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之地位和意义举足轻重，作为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玉器通史，南方新石器时代玉器发现的历史也是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史，考古学家走过的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也无不昭示着玉器研究上的历程，期间自然伴随有沉寂和波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成为研究的转折和兴衰点，在此背后实际上也包含了学科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整个社会背景的变革等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良渚遗址的考古试掘中虽然没有挖到玉器，“未目见为憾”，但是却揭开了长江下游考古研究的序幕。这其中，吴越史地研究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若没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浙财团（又浙江财团）兴起和支撑的背景，孤岛中的卫聚贤在《良渚》的校后记中不会有“书本子上的记载，是不够的”之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施昕更的心目中，“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是中国考古界的先进机关”（绪言），在提到“并不是有意掠美”《城之崖》时，文字中透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sup>[1]</sup>。20世纪50年代南京北阴阳营大量玉器的出土惊动了研究者，随之而来的即是土著性的、冲破中原一元中心论的“青莲岗文化”的提出。

【1】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出版，杭州，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